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七次全会精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延安实践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兰岚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延安市委第六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重大问题的讲话,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陕西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全面承接落实党中央部署,审议通过《实施意见》,为全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任务书、路线图。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上,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多措并举,以实绩实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延安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延安要聚焦以下七方面全面承接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和省委改革举措。

经济发展高质量。高质量意味着能够提供更多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经济发展要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实现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城乡等协调发展;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提高开放水平。不断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社会治理高效能。社会治理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应处理好维稳与维权、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坐标,增强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专业化、科学化、智能化,治理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有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文化塑造高品位。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深化文化领域改革,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好满足人民精神生活新期待。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让群众享受到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群众生活高品质。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

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生态建设高水准。生态建设既涵盖环境保护,也涉及社会发展,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新时代应始终坚持好生态就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理念,在生态建设上下功夫。筑牢生态文明之基,走好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质量。

安全支撑高能级。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加强安全教育,全面提升安全防线,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加强区域应急力量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强化安全监管,保障基层党建、意识形态、信访维稳、食品药品等领域绝对安全,依法严惩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科技赋能,推进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党的建设高标准。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能力,创新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改革作用。加强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强督导,重考核,抓落实,坚持追责问责;加强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开展,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作用,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延安实践的强大合力,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延安实践新篇章。

市委六届七次全会科学设定改革总体目标,准确把握市委“五个都要”的改革总体要求,聚焦政治站位、对标对表、延安味道、党的领导四大重点,完善促进“四类经济”发展机制,突出“七个围绕”全面部署构建“一园四区”协同联动推进机制、健全完善深化“三个年”活动机制以及积极推进其他重要改革四大板块26项改革任务,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以及延安改革发展工作,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久久为功,走出一条贯彻党中央精神、彰显陕西特色、符合延安实际的改革道路,把党中央战略部署、省委工作安排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延安实践。

弘扬延安红色文化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刘丽娟

2024年9月29日,延安市委第六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强调要创新守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制度机制。延安是革命圣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革命火炬的光芒让延安不仅是延安人的延安,也是中国人的延安,甚至是世界的延安。将延安红色文化传遍每个角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担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已然吹响了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号角。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基地,延安红色文化的传播更要在新时代、新号角下积极地引导和感化人们,在切身的现实生活中树立并坚持远大理想、共同理想。

弘扬延安红色文化对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重要意义。理想信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关键在于持续性、经常性,能够使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个体成长成才的全周期。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在方式上的规范性、系统性,能够把理想信念教育的举措上升为具有刚性约束的制度安排,通过建章立制的方式推动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实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其常态化的保障。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就必须发挥革命老城的主体作用,将党史作为教育的主要抓手,重点挖掘先烈文物和革命故事。延安现有革命旧址44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处、革命类纪念馆19座,馆藏革命文物4万余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3处,国际级抗战纪念馆、遗址6处,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弘扬延安红色文化是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途径。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一项复杂的实践课题,将延安红色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中,必须做到:第一,成立专门的机构,架构起延安红色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桥梁;第二,培养专业的队伍,研究、宣传延安红色文化;第三,在践行中创新制

度机制。近年来,红色旅游人气高涨。据《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突破20亿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接近万亿元。红色旅游不仅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文化产品,为革命老区振兴贡献力量。今年1至8月,延安共接待游客3328.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1.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71%、17.22%。通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文化内涵,创新红色旅游景区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机制,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厚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情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弘扬延安红色文化是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时代要求。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就是要时时刻刻进行教育,确保理想信念深入人心,也就是说,要将理想信念教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确保其成为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有机融入党内集中教育、国民教育、公民道德建设之中。党内集中教育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载体。延安红色文化的熏陶是党内集中教育的必修课。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从小抓起,贯穿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尤其要关注学校的思政课,这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延安时期历史的回溯,延安精神的内在要义塑造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延安红色文化理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公民道德建设的常态化制度化是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体现。延安红色文化丰富了延安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更有责任和使命创新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确立和巩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积极弘扬延安红色文化,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行稳致远,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进。

本组稿件由延安市委党校提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斗争哲学的形成背景

杨乐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了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革命经验及延安时期斗争实践的新进展,创造性地形成了其独特的斗争哲学。

斗争的必要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矛盾是复杂的、多样的,既有国内矛盾,又有国际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但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矛盾相对于中日矛盾处于次要地位,两党的共同合作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共产党如何同国民党合作是重要的政治路线,同时共产党还要联合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依赖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和合作原则,国民党的态度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的程度而转变的,当外部侵略严重冲击其根本利益时,不得不与共产党联合进行抗争。其结果是在日本积极削弱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加剧之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随之紧密;相反,当这种压力减轻时,双方的合作关系便开始发生转变,有时甚至会升级为激烈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在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如何妥善安排战线内部不同力量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挑战。而问题的解决,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辩证地处理,不仅要看到两种不同势力的统一性,还要看到斗争性,做到“既联合又斗争”。

斗争的可能性——总结两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

斗争哲学作为一种观念,是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进行总结所形成的理性思维,可以说,斗争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斗争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进行总结,进而通过《矛盾论》《实践论》进行哲学上的总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从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关系来看,斗争哲学从总体上为斗争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并不是割裂的,斗争哲学只能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进

行概括总结。

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革命的新生力量正式诞生。为了实现打倒军阀的目的,国共两党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同合作,开展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当北伐战争初步取得胜利之时,党内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和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导致北伐战争归于失败。在“八一”南昌起义后,党及时召开“八七会议”。在会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了大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深刻教训,确立了适用于中国特殊性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全党的努力下,毛泽东立足中国的革命现实,带领军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促使和推动其他根据地的建立。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开启了苏区建设的新局面。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其他军阀担心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影响其统治,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原则结合红军队伍特征,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红军主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历史上看,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正确或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正确的思想或错误的右倾和“左”倾思想造成的。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观,是两次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根源。正确的斗争观是中国革命制定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得到新发展的条件下,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毛泽东先后撰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的著作,分别对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再次进行总结,为科学的斗争观的形成奠定了经验基础。

毛泽东在1936年创作了名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全面审视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的革命战争经历,并且对王明在军事领域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阐释了围绕中国革命战争战略层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根据历史经验,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是非自然、顺理无阻的过程,而是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实现的。他指出,要想建立正确的路线并赢得革命战

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彻底战胜这些对革命及革命战争有害的倾向,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要彻底克服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要从哲学上进行清理,也就是从认识路线、从哲学方法论上进行根本的批判。《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成果。这三篇著作,使得科学的斗争观形成,进而形成斗争哲学。

斗争的特殊性——斗争实践发生新的变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哲学的形成建立在丰富、生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其在中国共产党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这一时期覆盖了土地革命的后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的中前期。延安时期因此被视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且独特的阶段。中国的革命实践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导致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矛盾更加复杂。面对这些复杂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斗争,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军事路线方面,国共合作存在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日本侵略者装备精良,实力不容小觑。中国,这个庞大却脆弱的国家,当时正受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制度的双重束缚,而国民党手中握有大部分的军事资源。尽管如此,由于其单边的战略执行导致连连败绩;相对地,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虽然装备简陋、物资短缺,却因坚持全面的战斗策略而频频获得胜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全面与片面的战略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发挥所长、规避短板、积累实力,这就要求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军事策略和战术原则。

在党的建设和组织路线上,延安时期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猛的发展,党员人数由早期的4万人几年间增长了数十倍。新吸纳的党员成分复杂,其中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小生产意识和经验意识的农民阶级,不同群体的斗争思想存在分歧。此外,大批的新党员和新组织没有斗争经验,对斗争的特点、斗争的规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懂得不多,故而,他们的斗争观与科学的斗争观存在很大的差距。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斗争观,并通过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化使得广大干部群众得以掌握。

(作者单位:西安欧亚学院)

1938年4月9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称“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题为《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要求抗大学员在抗大期间学习一个宗旨:抗日救国。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要学三样东西:第一,学一个政治方向。第二,要学做干部。第三,还要下一种决心(抗日救国)。其中,学一个政治方向,就是如今延安精神的内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延安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投奔延安。诗人柯仲平在《延安与中国青年》中,表达了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思想情感:“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岁月流金,信仰永恒。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馆时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正在成长于这片红色沃土的青年,要认识理解这一精髓。

首先,政治方向必须是正确的,所谓正确的就是科学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符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发展规律的政治方向。其次,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是坚定不移的、坚持到底的。毛泽东说,青年应当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些历史场景或许早已为人熟知,但每每重温依然让人震撼。28岁的夏明翰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刀枪,在临行前写下《就义诗》。这首诗饱含了一名共产党员火热的信仰和不灭的信念,他坚信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坚信会有和他一样的人甘愿为祖国的光明、为党的事业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回顾百年党史,有像夏明翰一样的青年把自己的鲜血、智慧、甚至整个生命抛洒在祖国的大地上。做政治方向坚定的青年就是要爱党爱国,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新征程上,青年要秉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精髓,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的担当和使命是不同的,但是奋斗和努力的方向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作为延安大学的一名教师,我认为,政治坚定是延安大学优良传统的灵魂。延安大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在延安精神的孕育下形成的,其思想内核和延安精神是一致的。作为新时代青年,理应立鸿鹄之志,展骐骥之跃,系好人生第一粒扣。成长从无捷径可走,应在踏实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在越是艰险的时刻越要奋勇向前。新时代青年要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人生志向,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生逢盛世,青年当有为。作为新时代青年,就要厚植爱国荣校情怀,做传承弘扬延安精神的时代延安大学人,争当信念坚定、求真务实、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善于创新的具有延安精神特质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做政治方向坚定的新时代青年

马涛